

秦 风 著

秦风

图文笔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相互欣赏的和谐史观

自1998年第一次投稿《老照片》以后，我不仅成为该读物的基本作者，也透过历史影像的窗口，进入中国大陆的文化世界。我从没意料到，老照片是我与大陆朋友心灵连结的桥梁，不过既然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付出一份心力，这种偶然也带有某种必然吧！

这本书就是我在《老照片》发表的照片和文章的菁华集结而成，其中不少文章被一些主流的报刊杂志多次转载过，并且引起相当的回响。我知道，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照片故事，正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看待过去的方式，让中国人面对自己的过去时能抱持更宽广的心胸，让不同思想态度的人能学习相互欣赏。如此，经由和谐的中国现代史史观，我们必能获得丰富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秦風

目 录

中国人首度参赛国际奥运	1
1937, 希望的延安	8
金山的山城岁月	36
日伪时期的古都北平	44
芷江受降的历史现场	54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64
川岛芳子的悲剧人生	86
石美瑜与南京日军战犯审判	96
东京审判的道德与权力	106
被改造的南京日本神社	116
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朱湛之遗骸寻访记	120
台湾：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140
梦雨斜阳不忍过	
——连雅堂家族的故事	162
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	176

从南日岛到东山岛	198
金门战役中的台湾视角	210
1955年：大陈岛纪事	216
冷战时期台湾对大陆的空飘与广播	230
台湾“解严”与两岸关系的变化	238
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	244
宝岛岁月半世纪	250
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	280

中国人首度参赛国际奥运

中国人第一次派遣大规模代表团参赛的世界运动会，是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这是希特勒登上总理大位的第三年，为了证明他的强国理论以及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柏林奥运会的规模超过以往各届，无论排场和宣传都气势惊人，犹如希特勒向其国际的竞争者挥舞着新德国的旗帜。

至于中国，一方面基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德国关系良好，另一方面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尽管内忧外患纷扰不断，但总的来说，京、沪、杭区域经济发展迅速，民族工业稳定成长，军事力量也有相当进步，比起民初军阀混战的乱局，实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国内体育实力仍不足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还是决定派出共计六十九名男女选手的大型代表团，首次到当时被视为世界列强中心的欧洲比赛。而且，基于地利之便，获得选派出国的选手也多来自京、沪、杭地区。选手们衣着笔挺出众，较之当时国际水平毫不逊色。行前，所有男女选手听取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训勉，同时又赴南京中山陵谒陵，希望能传承民族香火，不负先贤先烈之奋斗以及当代国人之厚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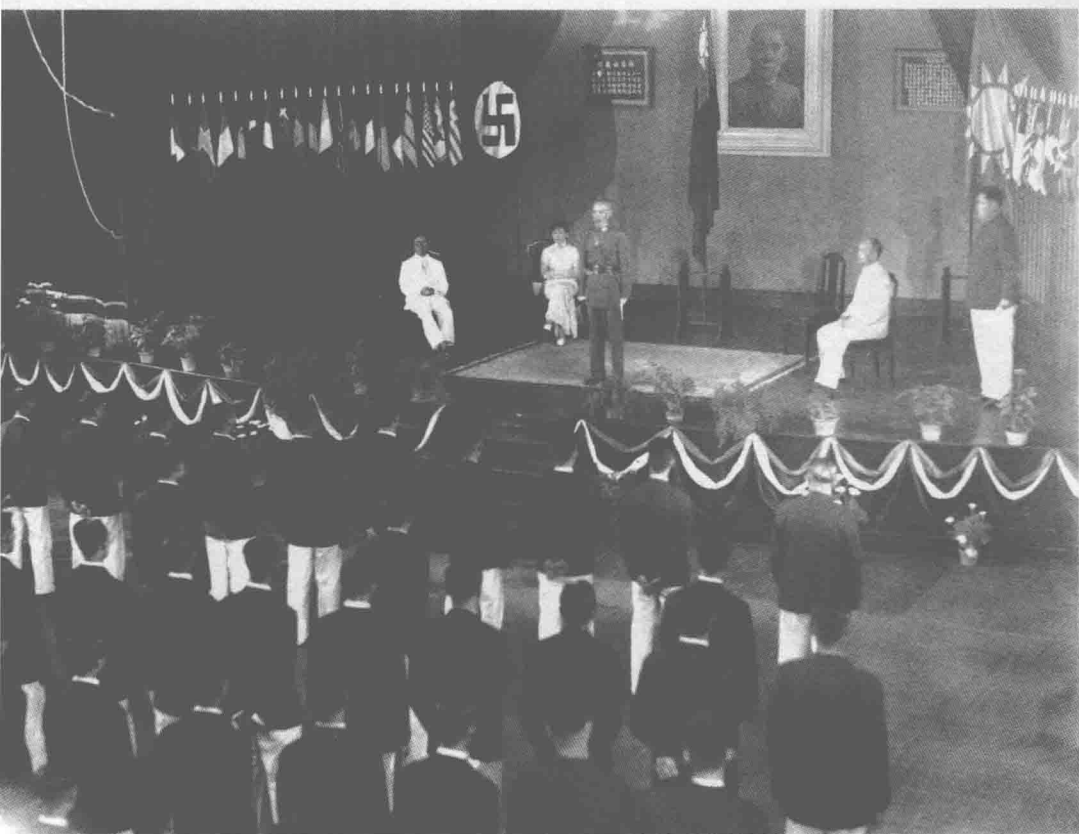
比赛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举行，在经过一场场激烈的竞赛后，结果不出外界所料，中国代表团全队铩羽而归，只有不列入比赛项目的国术队，随着代



1936年6月，中国选手出发前往柏林奥运之前，先到南京中山陵谒陵。

代表团归程中沿途表演，获得洋人一致的喝彩。看来中国队虽然在现代体育项目中暂时技不如人，但多少仍可依靠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华，赢得国际友谊，如此也不枉社会殷盼了。毕竟体育实力需要长期累积，而且需要随着整体国力的壮大，始能真正在国际间出人头地。

尽管比赛成绩不如人意，不过代表团搭船返回上海时，各界仍视选手们为国争光的英雄儿女，民众举着旗帜横幅，到码头去欢迎和鼓劲。代表团为了报答各界的热情，整队齐立码头，三呼“中华万岁”，后再乘市内渡轮赴新辟码头登岸，燃放爆竹。在随后的欢迎茶会上，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博士总结参赛经验，直言：“此次吾国遣派选手参加世运会，成绩如何，在未出国之前，早已预知，惟所以参加之原因，实为求取经验，并以前次洛杉矶世运会，吾国仅有一人参加，



1936年6月，参加柏林奥运的中国选手们出国前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送行并训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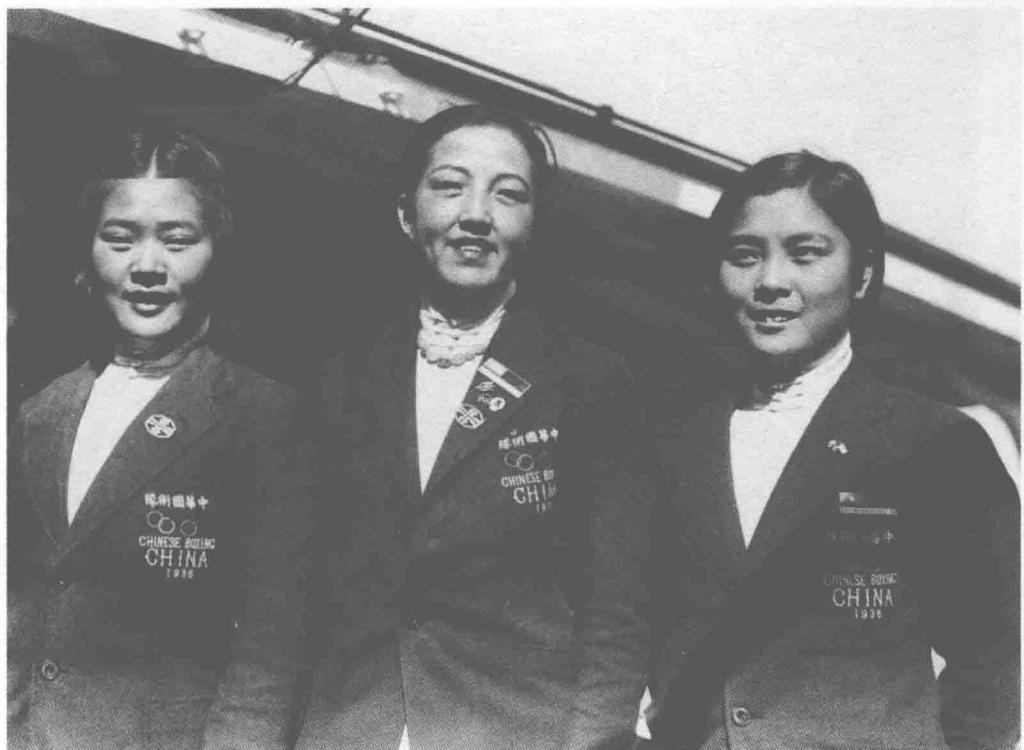
此次实为第一次正式加入……此次参加世运后，强弱悬殊，尚可使国人从而知从奋勉，有所努力……盖体育为教育之本，有健全的体格，然后有健全的精神，吾国数千年来，重文轻武，积习已久，此次参加世运之所以失败，其最大原因，由于体力不足，此点甚望教育当局，予以注意，国民体格与民族前途，深具利赖……本人提倡体育三十年，迄今未能造就一运动人才，殊为惭愧……”另外，体育考察团团员邵汝干也说：“本届世运各项成绩，较前有显著的进步，我代表团虽无成绩表演以慰国人，惟参加者已竭其能，因体格悬殊，技术稍差，以致相形见绌，



1936年8月，中国篮球队与德国法兰克福队比赛，以35比28领先。



1936年10月3日，上海市各界欢迎世运代表团归国，盛情感人。



1936年10月23日，中国代表队唯一令洋人喝彩的中华国术队队员傅淑云、翟连沅、刘玉华（左至右）返回上海时留影。

但大批人数参加，引起数十万观众之注意，亦足以改变国际之视听。”另一位团员蔡文礼谈到中国篮球队首仗就输在日本队的手里时，说：“综观对日一场失败原因。一、由于球员临场慌张，不能充分表演其技能。二、由于战法呆滞，不能随机应变，反为敌所任意摆布而无法应付，仅罚球一项，吾国有十五次掷篮之机会，结果掷进二次，殊为可惜。”以上所称中国篮球国家代表队十五次罚球，竟然只进两球，这种球技水平以今天的高中校队恐怕都不至于如此，希望他们在柏林奥运名列前茅，自是缘木求鱼。尽管如此，中国队首次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它至少代表着朝野已建立“体力即国力”的思想，并努力付诸实现。



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期间，柏林街头上装饰着带有纳粹艺术风格的雕像。

至于柏林奥运本身，这一年有五十三个国家，约五千多名选手参加，并首次采用传递圣火的仪式，圣火在希腊以日光点燃，然后由三千名运动员以接力方式经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最后抵达德国柏林。尽管希特勒希望利用本届奥运向世界展示纳粹德国的强大，不过在最具指标性的田径项目中，德国队只得到一面银牌，美国的黑人选手却包办了八面金牌、三面银牌和一面铜牌，其中杰西·欧文思表现最为杰出。在他参加的项目里，从预赛、复赛一直到决赛的过程中，一共打破或平了十二次奥运纪录，赢得了一百公尺、二百公尺、跳远及四百公尺金牌，被誉为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杰西·欧文思成长于美国南方的农家，从小就在棉花田里干活，农忙后才能上学。一直到了九岁，杰西·欧文思搬到克利夫兰以后，才有机会参加体育运动，并展现了惊人的天分。



柏林奥运期间，担任体育场安全守卫工作的纳粹军人，此照片为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的记者所摄，前排左边的军人向中国记者微笑表达善意，不过三年后，这支部队在希特勒的指挥下成为令人胆寒的武装力量。

十九岁时，杰西·欧文思便平了一百公尺的世界纪录，从此在运动场上展露头角。参加柏林奥运时，杰西·欧文思只有二十三岁，他令人惊叹的表现，使得一向宣扬雅利安白种人优越论的希特勒难以忍受，中途便离场而去。他原本是想通过柏林奥运来证明他的世界观，结果却反过来，成为他所蔑视的黑人证明他是错误的重要机会。

不过，无论希特勒如何难堪，有关利用奥运会展现国力的概念却传承了下来，成为日后所有主办国政府共同的追求。至于中国人更是几番奋斗、几番挣扎，数十年来奉为圭臬。

1937，希望的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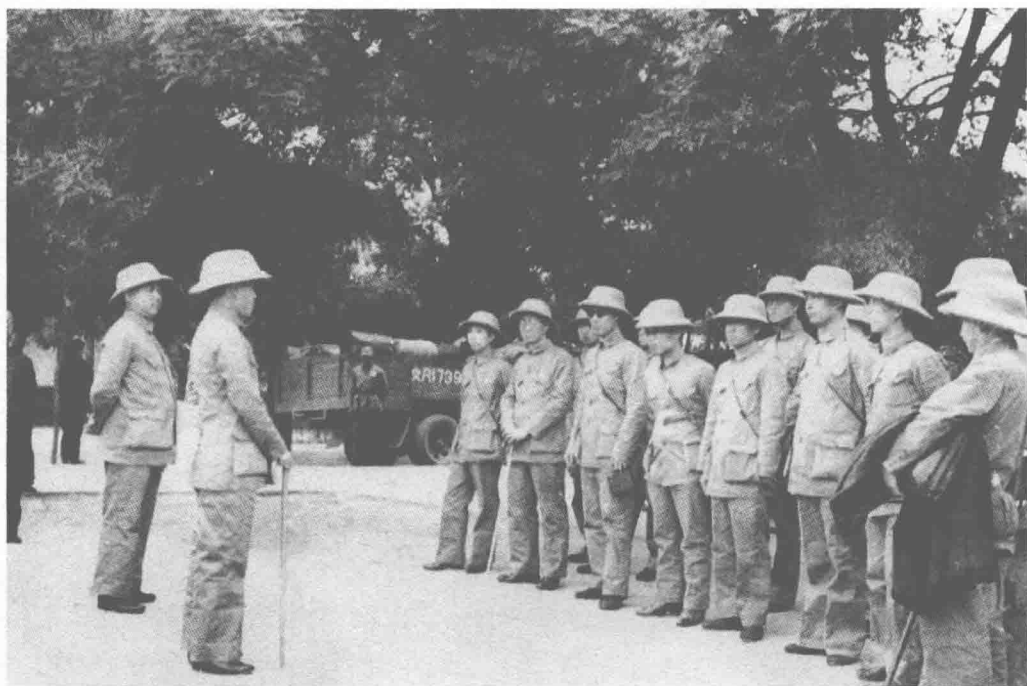
1937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国学者与新闻界的友人曾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充满着史实的感动。中共领袖们在长征之后仍保持坚定与自信，不过任何人都看得出，情势依然十分艰困，危机仍未真正解除。这点从几个革命领袖没有任何排场阵仗的言行举止，风霜满面的脸庞，以及对外发言时有意放低的姿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的确，在中共党史上，这可能是攸关存亡的严重关头，虽然“西安事变”阻挡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击，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但也使得蒋介石顺势取得了领导全中国抗战的正当地位。客观上，近三万名红军官兵分布在贫瘠的西北高原上，缺乏武器补给，生产资源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达百万之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配备了德国的新式装备，其他各路军阀见状只能靠拢，不敢像过去那样轻易纠众起事，加上京沪杭三角地带的工商发展欣欣向荣，蒋介石的政军经实力呈现跃进状况。比起江西苏区时代，国共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

尽管如此，延安的前程并非黯淡无光，军事上的挫败只是有形的，就精神上、人心上的无形力量而言，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弱者，从来不曾自卑自怜；相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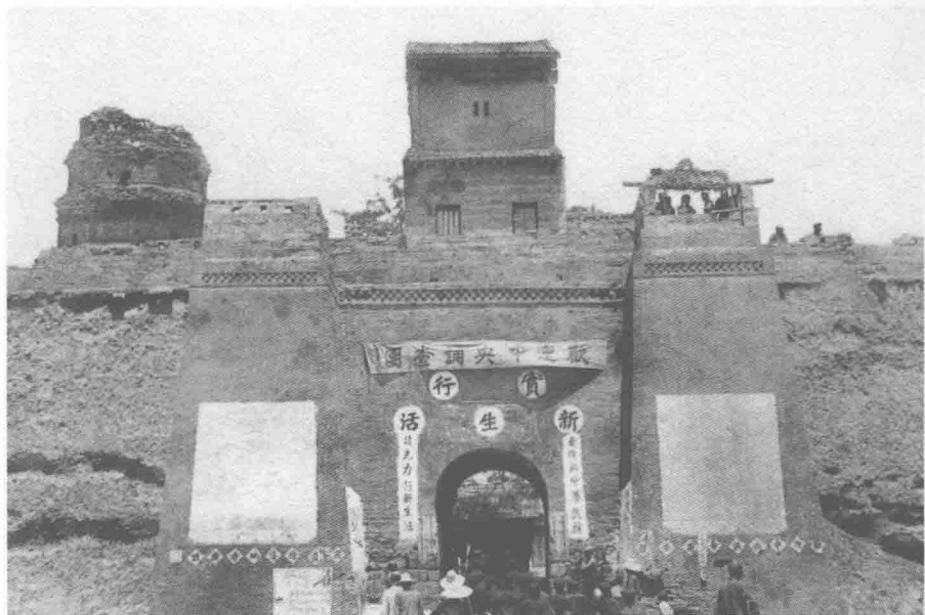


中央调查团出发前，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团员们发表谈话。



中央调查团出发前，团长涂思宗向团员说明此行注意事项。

有形力量的挫败，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务实的态度，有助于巩固意志，调整正确的方向。1937年初的延安，根本任务便在于保住最后的实力，创造最大的可能。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密集展开，共产党使用的提法是具有尊严涵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过查遍国民党的文件和声明却不见这个字眼。所谓合作包含着平等、对等的意思，可是在国民党看来，国共谈判的主要内容却是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以及中共要员以何种身份加入国民政府。这是谈判的基本框架。政治上，国民党希望无需动用武力就可将共产党吸纳进体内，利用强大的体制机器威吓收买，最后消化于无形；共产党则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取得合法的地位，保持独立的自我，并在合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本身的力量，以待有朝一日能再度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国共两党的斗争实际上是双方体制的斗争，涉及到的理想、纪律以及实践。在那种环境中，处于逆境的共产党必须对内部反复加强



延安城南门挂起“欢迎中央调查团”的标语，同时也呼吁“实行新生活”，以看上去与国民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

思想教育。事实上，确有一些红军官兵误以为他们不再需要依靠革命来取得正规军的地位，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了。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再三教育属下，在延安挂起国民党旗帜，穿起国民党军装后，共产党必须继续与国民党进行根本的区隔。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环境中，共产党对内的思想斗争必然十分严格，一切都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完整免受侵蚀。

2月初，东北军因王以哲被杀内部分裂，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加强了对陕北红军的军事压力，作为谈判的筹码。蒋介石派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国民党增派张冲、贺衷寒等人，共产党则派叶剑英加入，双方初步陈述各自的意见。9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设定与国民党谈判的基本立场，要求红军初步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每月80万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



欢迎中央调查团的红军鼓乐队。



延安城内的政治标语强调团结抗日。



延安城内的政治标语包括了“实现普选”等口号。

不逮捕共产党员，不破坏党组织，红军中的党组织不变。隔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又补充几点：中共应参加国府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抗日后参加政府。尽管中共中央立场明确，不过此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西北军）已呈分崩离析，红军又陷形只影单的不利局面，上述条件被国民党接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看成一连串讨价还价的起点。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致电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保证共产党：（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武装暴动；（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三）在特区政府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至此，顾祝同、周恩来等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部，苏维埃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原则达成协议，不过在具体细节上则陷入了可以预料的僵局。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尽管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提案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中共也尽量放低姿态以有利其主张，居于上风的国民党仍以严厉的语气通过“根绝赤祸案”：（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